

组织间关系如何可能

——杭州市复合型社会组织趋向的观察

卢成仁 毛丹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组织间关系如何可能

——杭州市复合型社会组织趋向的观察

卢成仁 毛丹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组织间关系如何可能：杭州市复合型社会组织趋向的观察 / 卢成仁, 毛丹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6

ISBN 978-7-308-18429-8

I. ①组… II. ①卢… ②毛… III. ①社会组织—研究—杭州 IV. ①C232.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6375 号

组织间关系如何可能

——杭州市复合型社会组织趋向的观察

卢成仁 毛丹 著

责任编辑 陈佩钰 姚嘉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夏湘娣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3.75

字数 200 千

版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8429-8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本书为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重大课题

“建设社会复合主体、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理论与策略研究（20100061）”

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

“社区视野中的社会复合主体建设与实践研究——以杭州市为例（12JDDF02Z）”成果

目 录

绪 论	组织社会学视野中的复合型社会组织	/ 001
-----	------------------	-------

第一章	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源起与发展	/ 019
-----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思考	/ 021
第二节	社会复合主体的生成与实践	/ 024
第三节	社会复合主体的研究及其影响	/ 042
第四节	从社会复合主体到复合型社会组织	/ 046

第二章	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	/ 053
-----	--------------	-------

第一节	复合型社会组织资源获得的途径	/ 055
第二节	组织内部的资源分配过程	/ 066
第三节	复合社会组织资源的效度	/ 077
第四节	资源视角下的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	/ 082

第三章	复合型社会组织中的理性治理架构	/ 087
-----	-----------------	-------

第一节	理性组织结构与复合型社会组织	/ 089
第二节	组织运作与目标实现	/ 096
第三节	复合型社会组织中的项目制和科层制	/ 101
第四节	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效率与复合型社会组织	/ 106

第四章 复合型社会组织中的激励与声誉 / 111

第一节 内部激励 / 113

第二节 外部激励 / 119

第三节 声誉何来:公益效率、行政赋予与社会承认 / 122

第四节 声誉与激励:双向复合过程 / 126

第五章 城市品牌网群:组织模式创新与复制的可能性 / 129

第一节 城市品牌网群的发展历程 / 131

第二节 城市品牌网群的结构:从“点线面块”到“组团+社团” / 136

第三节 城市品牌网群的微观运作机制 / 142

第四节 城市品牌网群的组织文化 / 154

第六章 另一种复合型社会组织:水酷生态村的实践 / 163

第一节 水酷生态村的缘起及社会背景 / 165

第二节 善水基金:社区环境问题的复合治理 / 168

第三节 从水基金到水酷生态村: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形成 / 172

第四节 水酷生态村的远景及复合型组织架构的影响和作用 / 176

第七章 结论:复合型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 179

第一节 组织社会学视野中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运作效果 / 181

第二节 复合型社会组织运作机制 / 185

第三节 复合型社会组织的类型与差异 / 188

第四节 从“国家与社会”到“国家、市场与社会”: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远景 / 191

参考文献 / 194

附录 本土社会学视角里的社会分类与复合主体 / 203

绪 论 组织社会学视野中的复合型社会组织

一、谷仓效应及其对复合型组织的需求

当专家们以理论探照现实,乐观地预期全球化网络正在创造一个无缝对接、彼此相连的世界,市场、组织、个人比先前联结得更紧密,一体化正在大踏步进行;吉莲·邵蒂(Gillian Tett)却透过对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危机的复盘,发现各大银行以及不同的金融团队各行其是,并不清楚彼此在做什么,就连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团队(理应彼此整合)亦各行其是。同样,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虽然抱怨银行业的短视和过度分工拖累了整体经济,但监管机构内部职能的零碎分散以及没有形成整合的组织架构,无法对金融危机做出有效反应,也使得危机的蔓延进一步加剧。因此,在吉莲·邵蒂看来,造成2008年金融海啸的原因是,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各个部门之间,将各自变成了一个个圆筒形的“谷仓”:只能看见自己上方小小的一片天,却无法突破谷仓的四壁围墙,更无法与其他谷仓联动起来。^①由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一个全球化背景下人、事、物加速整合的体系里,就出现了所谓的谷仓效应,即像被筒型谷仓罩住形成的独立系统,个人陷入自己所属的部门、团体、学科和知识体系中;组织陷入自身的制度条例、运作体系和固定反应过程中,封闭狭隘,缺乏谷仓与谷仓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只有垂直的科层制体系,没有水平的协同机制。

以“狭隘视野”与“部落主义”(tribalism)为特征的谷仓效应,不仅带来了金融危机,同样也能使一个誉满全球的超级企业趋向没落。1999年11月13日,在拉斯维加斯电脑展的主题演讲上,时任索尼执行长出井伸之展示了一包口香糖大小的数码播放器,引起了现场一阵骚动。2000年前后,正是全

^① [美]吉莲·邵蒂:《谷仓效应:为什么分工反而造成个人失去竞争力、企业崩坏、政府无能、经济失控》,林力敏译,台北: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6—19页。

全球科技业面临重大革新的一个时间节点,网络技术的成熟及其所带来的网络时代,已成为各大科技企业发展最核心的挑战。索尼公司能否适应网络时代?能否在网络时代里推出如同随身听的风潮产品?这是科技同行、新闻记者、索尼产品的发烧友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当看到出井伸之所展示的数码播放器时,在场的大多数人应该都会感觉:没问题。因为索尼公司在随身听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術,公司内部拥有完善的电脑研发部门,且拥有众多音乐与娱乐公司的股份,可以说随身听领域的天时、地利、人和尽在索尼公司。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同场演讲中出井伸之展示完口香糖型数码播放器后,马上又展示了一款笔型数码播放器。在电子产品销售领域发布新品时,往往以简单为原则,同一品类一次只发布一项产品,以免消费者(及自身销售人员)混淆。但索尼公司在这次新品发布中,同时展示两款数码播放器,而且还是分别采用不同专利技术制成的。在发布会不久之后,索尼公司又推出以“网络随身听”为名的第三项数码播放器产品。三项产品在市场销售中彼此竞争,索尼公司似乎是在自己在跟自己打架,而这也预示了索尼公司在网络时代的没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索尼公司出现了这样的战略错误?如果从组织运作本身的角度来看,正是谷仓效应的形成导致了索尼公司的没落。索尼公司在出井伸之时代,将公司分为众多各自独立的专业部门(如消费者影音、通信、半导体、纪录媒体等),自负盈亏,以激发效率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专业化的部门犹如一个个专业型的谷仓,尽管效率有所提升,可当专业型谷仓的管理层发现要自负盈亏时,他们就开始学习在公司内保护自己的部门(而不是公司),不再彼此分享创意,优秀人员不再跨部门轮调,部门与部门之间合作程度降低,彼此对抗却在升高,创新实验与长期投资逐步减少,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都变得短视功利^①。因而,出现了两

^① [美]吉莲·邵蒂:《谷仓效应:为什么分工反而造成个人失去竞争力、企业崩坏、政府无能、经济失控》,林力敏译,台北: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75—90页。

项同类产品在极其重要的全球新品发布会同时展示,三项同类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互相竞争的情况,这不过是索尼公司组织运作过程中谷仓效应的一个副产品,正是谷仓效应的存在让索尼公司在网络时代完败于苹果公司的iPod,趋向没落。

网络时代的两难困境就在于,一方面紧密整合,另一方面分散零碎,由分散零碎带来的危机和问题,则会随时冲散紧密整合的成果。那么,有没有可能克服以分散零碎为特征的谷仓效应?彭博(Michael Bloomberg)任市长时期的纽约市政府则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可能。在纽约贫民区发生的一次火灾里,消防员进入火情现场后无法突破受灾人所住的房间,在一旁围观的民众和消防员们都听到了房内传出的惨叫声,却束手无策,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状况。是消防员不够用心,还是他们没有牺牲奉献精神?“9·11”时纽约消防员的英勇和奉献,是有目共睹的。因而,这一事件深深刺激了纽约民众、媒体的神经,民众对原因的追问和媒体的连续报道,也让纽约市政府开始深刻反思现有的市政管理体系:虽然人手和经费的短缺是显在的因素,但各市政部门信息、思维方式和运作体系的封闭化则是更为内在的原因。换句话说,各市政部门视野狭隘,没有与其他部门联动的“部落主义”,所形成的谷仓效应,是这一事件发生的更为重要也更为隐蔽的原因。彭博市长对市政系统谷仓效应的破除,在组织层面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各部门办公空间保持开放,从外在的空间设置上强迫市政官员携手合作。他打破了纽约市政厅内传统小间办公室的设置格局,让市政官员都搬入空间宽阔的会议厅办公,每人一张同等大小的办公桌,而彭博本人的办公桌就在会议厅中间。二是将原先分散在各市政部门的专业信息数据系统,打通整合为实时更新、共同分享的综合数据系统。在火灾处理问题上,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措施,因而消防安全检查就变得极为重要。在这两项破除谷仓效应的措施实施之前,纽约市只有13%的受检房屋有消防问题;而在整合了消防局、房屋署、建筑局的人员与数据系统之

后,受检房屋存有消防问题的数量蹿升到70%。同时,谷仓效应的破除使纽约市政府在毒品走私、处方滥用、废油处理等问题的管理上,也取得明显的效果^①。

社区与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是社会治理这“一体”中的“两翼”,也是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两个重要对象,投入了众多的资源,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社区层面,随着不同力量扮演把社区组织起来的领导角色,分化出了两种极致的类组织状态:第一种是类政府组织(相应采取政府主导社区治理),第二种是类社团组织(相应采取社区自治)。所谓类组织状态,是指无论社区朝着哪类组织演化,与社区中的家庭与居民生活的一些内容和过程始终不适宜,也无法完全被高度组织化以及严密制度所刻板控制。两种社区类组织化形态,不仅无法很好地达到社区治理“善治”“良治”的目标,还逐渐形成了各自的谷仓,没能协作解决社区的问题。而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作为一种类别的组织毕竟注意力有限,公共服务完全由政府包揽,容易出现政府失灵的现象;但将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社会组织、行业组织来承接,政府完全放手,没有过程监督和规制,容易出现社会组织俘虏国家的现象,进而形成社会失灵。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解释上,也形成了这样一种两难的状况。

谷仓效应在组织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打破过分自成体系的谷仓,在一个个谷仓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形成相互的整合与联系。因而,打破社区类组织形态上的谷仓,破解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失灵与社会失灵两难状况的方法,是形成一种类混合组织(政府与社团及不同社会主体),采取混合治理或复合治理方式。而混合或复合治理的成效取决于两大关键:

^① [美]吉莲·邵蒂:《谷仓效应:为什么分工反而造成个人失去竞争力、企业崩坏、政府无能、经济失控》,林力敏译,台北:三采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19—39页。

(1)是否有合适的复合型组织出现;(2)有没有合适的运转机制,对外处理好组织与政府关系,对内处理好组织间、主体间关系,对“下”处理好组织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同时,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复合型组织究竟是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还是一种整合性治理方式?这决定着复合型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能走多远。因此,本书以杭州近年来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实践和探索为对象,尝试梳理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形式、机制,讨论复合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平台的作用和效应,进而希望从组织方式层面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另一种思路和可能。

二、对组织间关系及其困难的组织社会学观察

对组织的分类向来有多种标准,但就组织间关系而言,存在着同类组织与不同类组织的差别。对于同类组织来说,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从竞争走向竞合:当最初的竞争使两个或数个同类组织谁也奈何不了谁时,开拓和扩大市场、改善现有产业结构、增加各自竞争优势并阻止新组织进入的战略利益^①,使得原先的竞争者携手合作,形成一种组织间关系的连带过程。由单个组织走向组织间的合作,其中必然涉及组织间的分工、分配、协调、统合等事务和问题,因此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也称为组织间统治机制)的讨论,成为组织间关系研究领域的基础。

在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的讨论和分析上,目前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四种认识。

1. 从资源依赖论和交易成本论出发的科层制。资源依赖论认为组织间对于互补性、控制性资源的不同依赖程度,使得焦点组织得以管控、制

^① 吴维库:《竞争与博弈:组织间的竞争与合作》,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189—191页。

约、影响网络内的其他组织^①，从而形成科层制的组织间运作机制^②。交易成本论则认为，在组织间交换和流通的资源具有一定特殊性、稀缺性与不确定性，为使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降低交易成本，对外部化的组织间关系采取内部化、科层制的运作机制，无疑能最大限度地增进组织的本身效益^③。

2. 知识论基础上的组织学习机制。虽然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但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组织的核心职能之一就是应用、整合相关知识，从而在提供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基础上，获得组织持续的竞争优势^④。从有限理性的角度看，任何组织都无法穷尽产品与专业知识，向外部组织学习从而形成知识和认知上交流和沟通的组织学习，是组织间关系运作的基本机制^⑤。

3. 基于社会资本的嵌入机制。组织间关系主要透过代表组织的各个具体的人来实现和拓展，所形成的正式与非正式关系也使组织间关系从单纯的经济交换走向一般的社会交换。因而，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是组织竞争优势来源之一，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相互嵌入在组织间网络中，从而使基于关系的嵌入机制成为组织间运作的基础^⑥。

①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科层制运作后果之一是，网络内的弱小组织同样也会有意俘虏焦点组织。

② [美]菲利普·塞尔兹尼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与草根组织：一个正式组织的社会学研究》李学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马迎贤：《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理论的历史演进》，《社会》2004年第7期。

③ Yin, X. & Zajac, E. "The strategy/ governance structure fit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evidence in franchising arrangemen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4(25), pp. 365—383.

④ Bruce Kogut, and Udo Zander. "Knowledge of the firm,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 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3), pp. 383—397.

⑤ Schulz, M. "The Uncertain relevance of newnes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flow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4), pp. 661—681.

⑥ Gulati, R. "Alliances and network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19), pp. 293—317; Adler, P. S. & Kwon Seok-Woo.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27), pp. 17—40.

4. 基于环境认识论的“合法性—调适”机制。对于组织来说,物理环境之外的制度环境对组织产生持续的压力,组织与人一样也存在着基于记忆的认知基模(schema),在这一认知基模上,组织倾向于采取符合制度环境的行为。而组织间运作既要形成符合制度环境的合法性,也会依随环境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调适手段。因而,“合法性—调适”机制也是组织间关系运作的重要基础^①。

现有组织间关系运作上的科层制、组织学习机制、嵌入机制、“合法性—调适”机制,分别对应着威权、市场、信任、制度的维度,每一种维度分别形成一种组织间运作机制,这是我们从同类组织研究中获得的认识^②。同时,对于同类组织的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也带给我们另外一种认识:组织间关系最终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和利益最大化,虽然其中也存在着自利和利他的结构性因素(或是自利然后利他,或是利他然后自利),但在这一情境下也存在着既要取得合作伙伴间的互补性资源,又担心合作伙伴投机行为(搭便车)的两难困境;即,组织间关系运作过程中,如何辨识和克制合作伙伴的投机冲动与自利行为。

现有的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同类组织上,对于不同类组织的组织间关系运作过程研究还比较少^③。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是观察不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过程的适切案例:复合型社会组织内,既有社会组织(以合法性为基础),也有市场组织(以效率和利益为基础),还有政府组织,三种组织的性质不同,在思考方式和行动方式上也存在着

①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110页。

② 庄正民、方世杰:《策略观点之组织间关系管理研究》,《关系管理研究》2005年第1期,第85—114页。

③ 实际上也存在产学研联盟类的不同类组织间关系,但产学研联盟为了技术红利、企业利润而形成连带,与复合型社会组织基于社会事业的目的并不相同;同时,产学研联盟内组织间关系相对简单,只有生产企业与学研机构两类;此外,产学研联盟内企业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甚至支配地位,多元联动的趋向并不明显。参见邓雪:《产学研联盟内组织间学习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差异,如何协调并共同运作,这是一个问题。同时,不同类组织的目标、价值观、核心关注不同,承受压力的渠道不同,解决压力的机制也不同,彼此之间的跨越如何形成?复合与连带如何形成?从组织社会学的组织间关系研究视角看,复合型社会组织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组织结合在一起,有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探索不同性质、类别的组织能不能建立起一种协同,又或是一种整合的关系(能不能形成一种关系,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关系)。

对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经验观察,可以回应不同类组织间关系的理论问题:不同类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是科层制、组织学习机制、嵌入机制还是“合法性—调适”机制?是其中的某一种,还是互补的复合类型?如果是互补的复合类型,那么不同类组织的复合具有什么意义?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分工合作,还是形成共同体?如果说分工是一种交换的话,那么不同类组织交换的是什么?是利益、公共兴趣还是文化交往?如果说不同类组织间关系有其不同于竞争优势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想目标,这一理想目标是通向共同体,还是通向“二政府”?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历来是组织社会学研究进展相对较弱的领域,对于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调查和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复合型社会组织本身的问题,也有望提供组织间关系运作机制研究的案例,丰富组织社会学中关于组织间关系的讨论。

三、为什么选择杭州案例

杭州是我国著名风景旅游城市,人文荟萃,经济发达。2016年,杭州成为我国第10个GDP达万亿元的城市,进入了所谓的“万亿城市俱乐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6116元,是我国名副其实的先发达地区。杭州市总面积16596平方千米,其中市辖区8000平方千米,城镇化

率 76.2%，在城市社会建设领域，截至 2017 年 8 月，共有 7219 个社会组织^①。自 2002 年开始社会复合主体的前期探索，2008 年杭州在社会建设领域提出了社会复合主体的概念和实践，2014 年又在社会复合主体的基础上正式发文确立了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关于社会复合主体与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源起与发展，将有专章详述，此处从略），至此杭州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已经走过近 16 年的探索和实践。复合型社会组织的实践，也从前期摸索尝试，走向制度化、正规化的内涵发展道路。不过，选择杭州案例进行研究，或者说杭州复合型社会组织的探索实践，也有其更深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动力。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区制是作为单位制的一种补充体制而存在的^②。换言之，社区治理长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边缘位置，其更多是对“溢出”单位或无法进入主流生产体系的人员提供基本水平的管理与服务。这种状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逐步转变。伴随单位制的解体，由街居制改革而来的社区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主要构成部分，社区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城乡基层社会自我组织、自我协调的重要功能。近年来，随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目标不断践行，社区治理开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构成，其内涵也较传统的管理和服务有了更大的提升和转变，更强调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区治理手段的法治化、社区治理机制的精细化。社区治理从边缘到核心的上述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映射出的是当前中国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重塑社会支持体系的改革努力。

我国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指：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充分利用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和市场机制，特别是突出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协同政府、社

① 数据来源于杭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网站，http://mjzz.hzmmz.gov.cn/sw/site_xzxk_list.jsp?s_ywlx=shzz_cl，2017 年 8 月 27 日获得。

② 李友梅：《社区治理》，《社会》2007 年第 2 期。